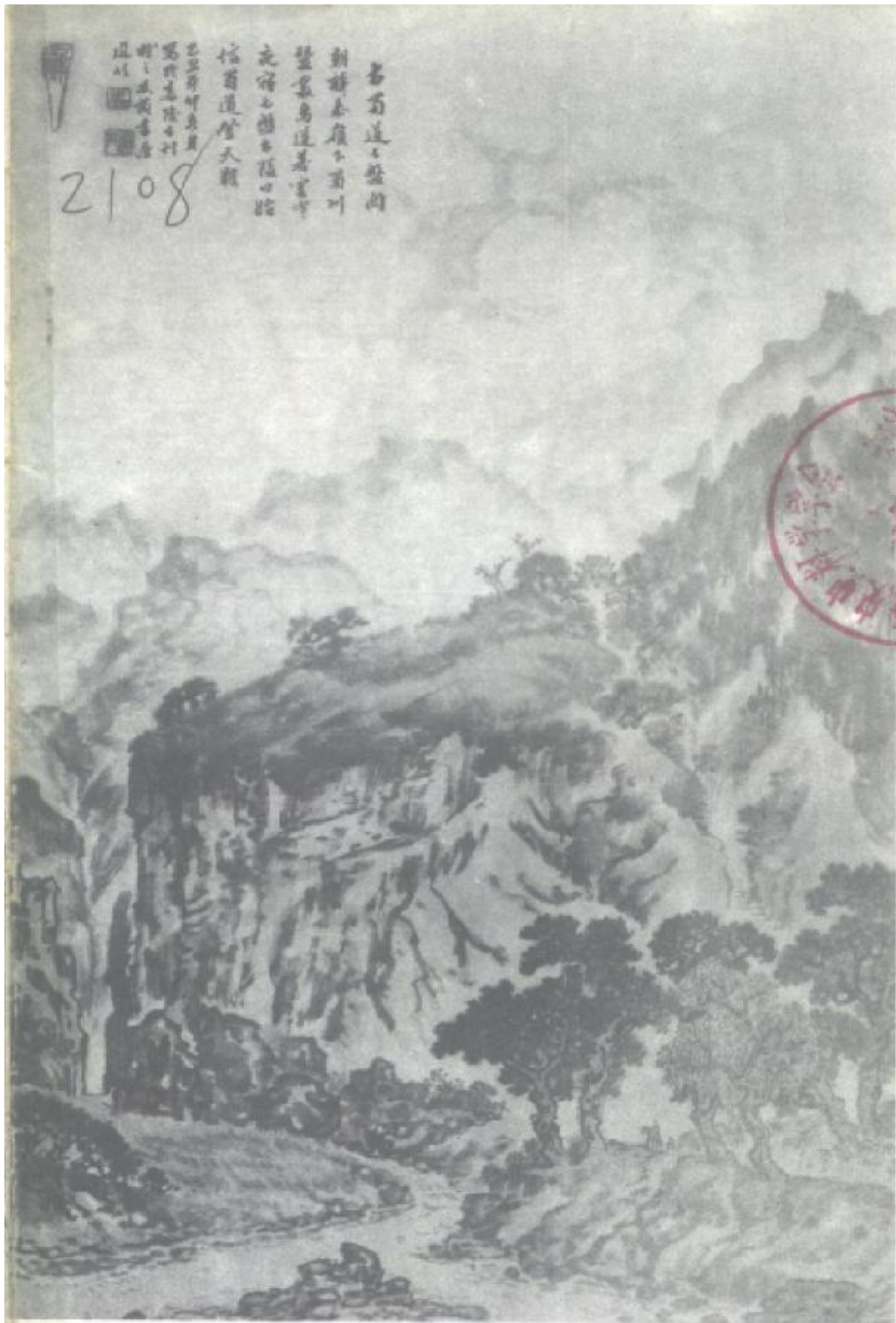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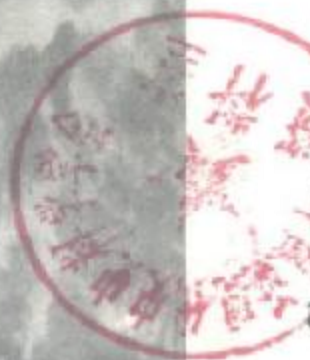


廣元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广元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目录

郭“皇帝”、猫儿“国王”其人	童朝俊	(1)
回忆广元县自卫总队的活动情况	陶德洲	(5)
1. 自卫总队成立的起源		(5)
2. 我接替付总队长的原因		(5)
3. 去陕西汉中向胡宗南要枪		(6)
4. 出席剑阁专区行政会议		(8)
5. 照保安总队指示办事		(8)
6. 修筑达广公路		(9)
7. 挖墙脚与反挖墙脚		(9)
8. 设政治部以后		(10)
9. 复杂混乱时期		(11)
10. 起义回城经过		(14)
11. 后来的发现		(16)
一九四五年广元竞选省参议员纪实	苏仲威	(17)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超然主计制度	邓绍滨	(19)
胡宗南军宣传工作一瞥	徐 行	(26)
新九师扰民小记	邵家仁	(35)
民国苛捐杂税简记	丁 敏	(38)
凤凰山公园话凤凰	钟怀玮	(41)
漫话翰林	童朝俊	(42)
回忆广元豫剧团建立的艰苦历程	陈松山供稿 陈凤翔整理	(45)
封面：广元七盘关古道（国画）	马凤岐	
刊头题字	马 可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

郭“皇帝”、猫儿“国王”其人

童朝俊

三堆“皇帝”威名扬，猫假虎势也称王。

“天子”龟缩凉水井，“大圣”独霸白水乡。

解放前，昭化县人口不过十万左右，辖城关镇、三堆、白水、（已于一九五二年划归青川县）宝轮、凉水、射箭、虎跳、盘龙等十一个乡。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境内交通闭塞，文化、经济十分落后，据说本县入大学生只有数人（国民党昭化县党部书记长汤文彬是大学生之一），高中生也屈指可数。但由于地域辽阔，插花飞地甚多（如三堆坝上场头就插有原广元县管辖的一个保），形成了鞭长莫及，有时政令不能出县城，县太爷要召集各路“诸侯”（即乡长）到县城开会，这些“诸侯”有时可以“矫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民国中末期的昭化县长刘光乾、徐兴益等有时到这些“国中之国”去巡视，都要带上一中队警卫保驾（当然也有显示威风之意）才敢出巡，而且大多是速出速回，不敢久留，免生意外。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根据地理条件的不同，形成四个独立王国，乡长俨然成了土“皇帝”各霸一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忆起来已事隔四十多年矣。今日之昭化（已于一九五八年合并于广元县），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旧貌变新颜，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人云：“欢今宜鉴古”。现在能知所谓“郭皇帝”，“猫儿国王”，“闵天子”，“齐天大圣”（解放后四人均被镇压）之详情者恐不多矣。为使其“盛名”恶迹不至湮没，今特简忆其况。

他们四人是何许人也？一是三堆乡长郭守歧，外号人称三堆“国王”。二是虎跳乡长熊介眉，外号人称“猫儿国王”。三是凉水井乡长闵绍霖，外号人称“闵天子”。四是白水乡长曹子太，外号人称“齐天大圣”。四人虽都是乡长，袍哥大爷，有剥削人民，压榨百姓，鱼肉乡里的共性，但由于各乡所处的地理位置，各人玩弄的权术不同，又各有其特点，故一般人对他们的外号称呼也就各异。

所谓“郭皇帝”者，乃三堆乡长郭守歧也，号凤鸣（取凤鸣岐山之意），民国中、末期连任三堆乡镇长、乡长（袍哥大爷），此人年青“英俊”，身材魁伟，一付酒糟鼻子，常身着长衫，眼戴墨镜、头戴博士帽，手抒文明棍，身边常有一人身别盒子炮的马弁保镖不离左右。如下保巡视必身骑高马，随带一班队丁保驾，可谓威风八面。他处事圆滑，面善心狠，有人讽之为曹明公（即曹操）。当时我们场上有几个高小毕业学生欲到外县去读中学，请求他支持帮助，他表面答应，背后却说：“帮这些学生到外面去读书，等于栽林养虎，虎大伤人”。实际上是怕这些学生到外面读书回来后捣他的乱，对他的一统江山不利。他初登上乡长宝座，既能拉拢清末民初的一些地方遗老——团总、管带；又会讨好县城中共、政机关要人和新贵的信任，因而得到好评。民国中期的三堆坝是昭化县的一个比较繁荣商业水码头，是通往武都、碧口、白水、姚渡等地的咽喉，又是生丝、桐油、桃仁、木耳等山货土特产品的集散地。汉口、重庆、保宁、南部、广元等地常有庄客长期住扎三堆收购贩运山货土特产品。郭“皇帝”身边既有文臣又有武将，如乡公所的自卫队长严光荣（解放后被镇压）就是效忠于郭的心腹“大将”，他善于虚张声势，猛冲猛打，为虎作伥，街乡群众见到此人无不退避三舍。严中行（解放后被镇压）高中毕业，曾在成都伪军管区当过职员，解职回三堆后自命不凡，认为是“凤立鸡群”，很是“清高”，后来由于自身的经济情况不佳，美况愈下，于是不得不依靠郭“皇帝”求得一官半职，郭也深知必须拉拢这个曾在省里当过差的“秀才”，为自己出谋划策，一统江山才能巩固。于是郭便向县府、县党部保奏任命严中行为国民党三堆区分部书记，区田赋粮食征收处主任。并保奏其妻弟王禹九任三堆乡小学校长。他们互相利用，于是严、王二人无形中就成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文臣”了。所以三堆坝的一般群众称严氏兄弟为“郭皇帝”的左右二膀。除此以外郭还以袍哥大爷的身份，拢罗了一批兄弟伙和退伍住在三堆的国民党军队的排长、班长一类打手为其保驾。乡以下还有忠实于乡长的十三个保长，随时监视着不满于“皇帝”的“臣民”，因而“郭皇帝”在三堆坝的统一天下能得以巩固，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远近幕名。就是住广元城内新九师的中、下级军官和大名鼎鼎的赵朗如、汪良臣等对郭都很幕名，而且还有交往。

蒋介石入主四川后，表面上禁烟，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便藉此大发横财，武装贩运鸦片烟成了家常便饭。当时一般达官贵人都视做鸦片烟生意是最好的生财之道，他们几乎都通此道，而“郭皇帝”表面上虽不大做此生意，但凡是广、昭等地人去碧口、姚渡、南坪贩运大烟等，几乎都要与郭大爷捎带“南土”（鸦片烟），作为效劳或进贡之礼，方能通过关卡

“国界”。这样“郭皇帝”表面上既执行了国民党官府的禁烟政令，而又坐收渔人之利，可以名利双收。另外郭的手段毒狠，据说：当时驻广元城内新九师的一些“丘八”，常牵到三堆坝乡下偷鸡摸狗，敲榨勒索，强奸民女（如有五个烂兵曾在三堆坝乡下轮奸了一个姓周的少女），郭知道以后，便令其手下将这几个“丘八”黑办了。由于老百姓非常痛恨这些胡作非为的烂“丘八”，因此不但无人向上告发，反而认为郭乡长替民除了害。解放前土匪横行，到处抢人习以为常，但这些土匪都不敢到三堆街上来光顾，记得在十几年中只有零星土匪只敢在离三堆场上约十里路远的大高山、础石栈关过圈圈，（即土匪在偏僻要道把人关在一间屋里把行人身上的银钱货物搜光后即逃跑，谓之关圈圈）这正是“郭皇帝”善于运筹帷幄，处理“朝政”绝招。在一九四六年时，“郭皇帝”国运亨通，威名大扬，感到原来的住处不足以显示“尊荣”，于是就在三堆场头上的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营造“宫殿”，限于当时的条件，虽全系土木结构，但规模宏大，估计约需木材数百立方，通由各保长叫老百姓限期抬送到工地上。保长们为了立功，只要看上那些树好，不管是谁家的“风水树”或老人们留作做棺材的都砍了进献给“皇上”，老百姓叫苦连天，但谁也不敢公开说个不字。经过两年的苦心营造，“宫殿”大体落成，“皇帝”刚乔迁不久，正想座享荣华富贵，就在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南下到汉中，县长和乡长们吓破了胆，惊恐万状，但又不干于失败，企图负隅顽抗，于是伪昭化县长徐兴益就潜来三堆坝，欲借袍哥势力组织反抗人民解放军入川，徐感到县长的招牌已经不大亮了，就换成袍哥大爷的身份，叫郭在新居内召集街乡两地袍哥“敬神”（开会），常言道恶龙难攀地头蛇，何况这又在“非常时期”，在“敬神”期间徐兴益就利用郭大爷的声望，郭也借用徐县长这块招牌，借敬神之机就地号召组织成立“反共救国会”，红旗管事当场还杀鸡“盟誓”，表示“效忠”于“皇帝”。参加敬神的袍哥三爷、五哥、幺大等兄弟伙中有好多是不明真象受骗或迫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基本群众，真正死心踏地跟着伪县长、乡长跑的是极少数。“敬神”之后徐兴益也就阴到溜走了。不久一声炮响，驱散了天空中的乌云，我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了昭化县，“郭皇帝”的美梦也就随之告终。

为什么人们把虎跳乡长熊介眉称为“猫儿国王”呢？这是因为虎跳乡地处嘉陵江边，是水路船只上行昭化、广元、三堆、白水，下行苍溪、南部、保宁、顺庆等地必经之路，解放前沿江两岸群山笔立，峭壁陡崖，陆路只有羊肠小道，由于地势险要，客观上就给熊介眉称王提供了地利条件，同时虎跳沿河一带在民国时期又是“绿林好汉”（即土匪）拦路洗劫之

地，土匪横行多如牛毛，而熊绍介又里通混水袍哥（土匪），掌红吃黑，座地分赃，过往船只和客商，常常都遭到抢劫，不得安宁，被害者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过去人们要想去虎跳，真是谈虎色变。就是一般下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欲路过虎跳，也必须先向熊大爷言语拿顺，进贡方物或“南土”，否则要受其害。致于该乡老百姓就更受其害。一切由他主宰，士、农、工、商怨声载道。由于熊大爷“带过”太多，树敌甚众，怕遭人暗算，也就不敢轻离“国土”，只能在虎跳“领土”内称王称霸。所谓猫儿，因虎跳的虎字，一般人忌讳，便将虎字以猫字代替，故虎跳就习贯地称为猫儿跳了。乡长熊绍介在猫儿跳割据称王称霸，恶迹昭彰，昭、广、剑一带闻名，故外号人称“猫儿国王”。

凉水井乡长闵绍寿，因地处江油、青川交界处，十分偏僻，尽是大山，交通闭塞，是昭化县最边远的乡，与外界接触较少，故该乡群众只知有闵乡长，不知外面天有多高，地有好厚，兼之闵绍寿又是少数民族（回族），群众一切听他说了算，他自命不凡，是十足的“山大王”，故而外号人称“闵天子”。

白水乡长曹子太，此人身材短小精干，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善于应变。如在一九四三年左右，白水乡一带遍种鸦片，风声外扬，伪县府也座不宁，怕上级追查。为了声张禁烟政令，昭化县长刘光乾亲率一中队人马前去白水查禁种烟，声势很大，由于“齐天大圣”曹子太善应变，即与县太爷送了“包袱”并买和随行李丁，结果刘光乾在白水乡一带令其衙丁象征性的铲了一点烟苗，虚张声势一翻，便率领大队人马打道回衙，随即便向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报功了之。而身为种烟贩烟罪魁祸首的“曹大爷”也就平安无事了。故而外号人称“齐天大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昭化解放，人民当家作了主人，“齐天大圣”万变也逃不脱“佛爷”的手心，受到人民的惩处。

补 正

《广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封二所刊广元千佛崖原貌照片系
广元县文物管理所供给的，特此补正。

回忆广元县自卫总队的活动情况

陶德渊

一、自卫总队成立的起源

我县自卫总队是在蒋介石一九四七年掀起从东到西全面向解放区进攻高潮中，奉四川省政府通令与各县一道成立的。划归省保安司令部指挥，表面是保卫地方治安，实际就是防共反共。通令规定总队长由县长兼任，付总队长由县长选保地方人士充任，具体负责编练指挥工作，开始是由县党部书记周春生兼任，但他不是军人，不会编练指挥工作。在一次县行政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我，出席者纷纷来向我道喜，有人劝我出来再活动一下，我表明早已发过誓，不再任公职，更谈不上出来活动，我半生中从未为工作职位活动过。过去当广元县经收处主任是县长罗崇礼再三劝我才干的。结果付总队长由上面委下来变成了吕化如，据说是周要找听他摆布的人，与县政府合谋干出来的。吕在部队多年，也是军校成都分校同学，资历是够的，但他家住柳桥，对城内情况不熟，在全县更无威望。总队部辖有两个常备中队，队员是由各乡镇派员轮流充当。总队部要供给饮食、服装，找款拨粮，常感困难，弄得吕化如焦头烂额，他勉强支持到一九四九夏，坚决请辞，回到柳桥不来了。

二、我接替付总队长的原因

当时广元县长黄爵高，曾在45军任过团长多年，我与他有同事之谊，他公余常到我家来玩，吕化如辞职后，黄来请我接替，我仍表示早已发誓，不干公职，请他另找人，他接连跑来找我几次，我始终答复照旧。最后他正色说：我来广元任职，广元的老同事曾极表欢迎，并愿合表共济，将县事搞好，现吕遇难而退，你是适宜的人，你却再三推卸，公谊和私情你过得去吗？他这一军，确把我将住了，我只好承认，暂时代理付总队长职务，只对他负责，不要上报请委，他欣然同意，立即领我到桓侯庙（现北街广元县印刷厂处）总队部，集合干部和两个常备中队，宣布我就任付总队长职。

总队部人员有付官李子元，干事孟继曾，汤玉辉，文书李政，第一中队长汪尚武，第二

中队任克强。李子元与我自幼是同学，又同是军校成都分校同学，他从自卫总队成立时起即任现任，还住过剑阁专区游击干部训练班。黄县长接着向我介绍了自卫总队各方面的情况，总队部照编制还缺一总务干事、司务长，常备中队照规定有三个，因经费困难，只成立了一、三两个中队，编制约同一连，中队长、三个分队和司务长，正付班长18名，伙夫五名，这些人员是固定的，队员由各乡镇派人轮值，半年一换，供给伙食服装。每个乡镇设自卫大队，大队长由乡镇长兼任，另设大队付具体负责编练。大队、自卫中队是由富绅子弟编成。还有不脱产的宣传、侦察、救护、担架、运输等队。李子元搬来一堆卷宗给我，架上堆满全县自卫组织名册都来不及细看，我到两个常备中队检查，第一中队住北街桓侯庙戏台上，条件较好，三中队驻大西门城楼和关帝庙（现西街蔬菜公司门市部处）完全是地铺。两队队员衣服破烂，所有武器全是破烂步枪，伙食吃的碓米菜少油，队员患病无医也无药，真是一个烂摊子。我找卢百臻任总务，薛联生任司务长，首先解决肚皮问题，由黄爵高县长下条子去找饶会计任主拨了一笔款，田粮处长高扬是老朋友，拨粮更无问题。我下令碓米要加碾，菜里多加油，暂定半月牙祭一次，有病请医，并给三中队补充了铺草，县参议会议长权章夷老先生处存有过去办工厂的窄白布，主动愿交出给自卫队员做衣服，拿来染成灰色，不到一月，两队班长、队员都穿上新衣。权老先生此举真是雪里送炭，他这种主动真诚，尤使我们感动，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存有布。

三、去陕西汉中向胡宗南要枪

自卫总队的武器在县里无法解决，参议员刘汝楫（中子乡人）建议去向撤退到陕西汉中的陕西绥靖主任胡宗南要，刘在胡部下干过事，他知道那里换下来的旧枪很多，但单说要枪难以开口，我估计胡失守西安，败退陕南，心里一定很难受，我们若以地方名义去慰问，他定然高兴，要枪就更有把握。我把此想法和黄县长、商会主席汪良臣、县参议长权章夷、汉寿镇镇长赵朗如等人商议，他们都赞成。这时，胡宗南派来广元的先遣少将王宇君高参，住在赵朗如家，我问他可否去汉中，他很高兴并主动向胡电报，胡复电表示欢迎。王表示愿帮我们要些枪弹。

慰问经费由汪良臣从商会中出，我们制了一面锦旗，上绣“秦蜀屏障”四字，上款写的是：献给陕西绥靖主任胡；下款写的是：广元县政府机关法团敬献。另外，还送川盐二十包作为礼物。慰问团成员，由社会科长雷世煦代表县政府，我代表自卫总队，刘汝楫代表县

参议会，汪良臣代表商会，县党部书记长周楷生去蓉未归，由前任书记长候元坤代替，陈九魁代表全县乡、镇长。由王宇君领着我们搭车赴汉中。进入宁羌沔县，即见到到处是兵，骡马散于山岗，大炮放在田间、汪带有几个兄弟伙，押运盐车。另外，袍哥大爷苏文华吹嘘他在成都川西坝子有力量，王顺便将他带到汉中见胡，但他不属于慰问团成员。

我们进入汉中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顶布满白色斑块，设在银行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当时不解，夜暮见无数乌鸦从四野飞集，栖满所有房顶，嘎嘎之声不绝，半夜亦不时哀鸣，原来白色斑块是乌鸦拉的粪便，在别处从未见，而这些乌鸦颈上都有一团白毛，也很独特。

招待所伙食办得很好，原拟开大会献旗，后改在绥靖公署宴会，将锦旗悬挂在宴会厅正中，王宇君向胡介绍慰问团成员，胡一一同我们握手。我向胡谈豫南会战时我在45军125师受过他的指挥，我二弟陶德昌现在306师1008团任团长，表示关系不同异常，胡听后连连说好，并拉我入席，晚上又招待看戏。次日《汉中日报》记者向我采访，我说：胡主任抗战初期率部参加上海保卫战，重创日寇，接着指挥豫南战役，打乱了日寇围攻武汉的计划，以后长期坐镇关中，限制共党发展，东拒敌人于潼关之外，并多次派部队支援各战区，保卫西北，屏障西南，功勋甚伟，现又固守秦岭，我们四川可以安枕，故特以最大诚意前来慰问。但我心仍在要枪。报上发表后，王宇君对我说：绥署对你的谈话，全面得体，很是赞赏。第三天绥署派了小汽车供我们乘坐游览，曾到牛褒惠渠，看了新的水利建设，和石门上曹操写的“褒雪”等文物。

同日，王宇君送来给慰问团的礼品，每人一支新左轮手枪，和子弹一百发，并说：胡长官已下令给广元自卫总队修好的汉阳造步枪五十支，步枪子弹一万发。我们表示感谢！

此后，我们各自活动，汪良臣，苏文华与汉中袍哥开联欢会，大摆香堂，相约互相支援，我们都未参加。我抽空将带来的一捆贬值不知若干倍的法币，找到一个兑换处排队换了五个银元，算是变废为宝。

晚上，胡宗南约见我们，由王宇君领我和汪良臣，候元坤三人到汉王台胡住处，在一间挂绿布幔的屋里，我们排坐在沙发上，胡与我们对坐，我们首先感谢他对自卫总队的枪弹补充，并赠我们左轮。胡宗南说：旧枪还有，但尚未清查、修理，以后还可以发。接着胡以低沉的声调谈形势说：收复西安并不难，但要固守则需较大的兵力，和屯积大量的军用粮，不免限于被动，为了争取主动，故退守秦岭，相机消灭敌人。我们说：秦岭有大军扼守，无异长

城，我们四川可以安枕，如有需要之处，请即面令，我们尽力照办。现正赶修达广公路，修成后则川北东西交通可以改善，便于军事调动。胡笑说：很好，很好！随即我等再谢辞出，胡送到门外说：以后到广元去看你们。这句应酬话，后来事实证明竟是他决定经四川夺路西逃的思想流露，后来才知王宇吾送给赵明如、汪良臣各一份咨议委状。次日，王宇君同我们乘车返广，所发枪弹是由汪良臣带来的兄弟伙领取，装车运回的。这五十支步枪，我决定完全给一中队，将一些太烂的枪挑出修理。适逢樊伯强老先生去世，我即派穿新衣，荷好枪的一中队参加送葬，引起县人惊奇！

四、出席剑阁专区行政会议

八月，剑阁专区召开行政会议，按规定由黄爵高、周椿生和我出席。到剑阁后，我们在一个临街的茶馆乘凉，适专员刘骞经过，黄起立招呼，他即走进，黄将我介绍给他，刘说：我给你负责，并坐下畅谈，没有专员架子。次日开会，会议内容，无非是动员反共，无精彩可言。大家对我县借慰问前赴汉中向胡要枪弹一事很感兴趣，纷纷来询问详情。后来听说通、南、巴等县都仿效我们去过汉中。最怪的表演是第三夜摆香堂，要出席人都去参加，先每人交一银元领一个什么（记不起名）社的铜牌和一份组织章程，宗旨是发动社会的力量反共。接着香烛辉煌，一齐叩头行礼，刘以舵把子身份，封每人新一大爷，周椿生等早已是大爷，我也不是白丁。广元早有亲仁、忠义两社，黄和我对此道都不感兴趣。黄说：县长的威望，现在只隔一张纸，若再操袍哥，见了喊大哥，就纸也没有了。

不久，刘骞来广元视察，我集合两个常备中队和汉寿镇的富绅子弟队请他检阅并训话，在总队部设宴招待，他对喝的徽县大曲赞不绝口，我们只好又买几瓶送他。他非常满意。

五、照保安队指示办事

广元县自卫总队设北街桓侯庙内（现印刷厂处），我到自卫总队不久，有从旧军队中来的青年欧文凤、张绍杰二人要求为桑梓效力，我向黄转报后决定委他们为参谋，我派他们对常备中队和汉寿镇的自卫组织的训练进行督导。九月，保安总队指示，办情报人员训练班，总队部令每乡选派一人，集中训练一月。我讲话说：以后不但要注意共产党活动，还要注意军队劣绅土豪，因为他们害民，给共产党制造机会活动。训练班课程派李子元、欧文凤、张绍杰三人担任。训练期满后回乡，规定每月写情况报告，急事立报，由李子元汇总。欧文

凤建议：找个军统或中统的人来管情报，我说：这些人专门害人，我们岂能辑盗入门。以后，保安总队部又令报对共军扼险堵击，破坏交通等。我们报了计划略图、北路据九区和竹把山截断川陕公路；南路据梅林关虎跳截嘉陵江通航；西据天台九峰诸山，控制公路。并普遍挖通断险路的计应，完全是纸上谈兵。

六、修筑达广公路

达广公路是奉省府令建通的，本不属自卫总队的事，但因我是筑路委员会主任，且在汉中向胡宗南报了这条路对军事上的重要，故写在此处。而我之热衷于此，除修路对发展经济文化有关，却另有内幕。此内幕是：大华纱厂用煤，原靠须家河供应，因受垄断之苦，欲另谋出路。熊厂长再三向我请求，并得地方多人赞助集股成立了利华煤厂，以张坝进煤，张坝一带煤质比北路的好，但运输无公路，用马驮运、木船水运，成本均太高。修达广公路，从安家湾再修一支路直通张坝产煤区，用汽车运输即可大占便宜。为修广达公路，我曾亲同省里派来的周工程师勘测定线，并由县府征调民工赶修，在临解放前夕很快完成了广元境内的土方工程，到尖场子上。这条公路，利华煤厂虽未及用，但解放后为开办荣山煤矿、并修轻便铁路，广巴公路、及广旺铁路、做了初步工作。

七、挖墙脚与反挖墙脚

十月、陕西军情日紧，胡军渐有过境西撤，东路传来共军进攻消息，广元风声日急，黄爵高，周椿生等人先后借故去蓉，一切问题要我单独处理。首先是自卫总队的粮食一时不济，我还借过我岳父家存在马家坝的谷子充作军粮。

由于王宇君的策划，汪良臣、赵朗如、苏文华和青帮头子姜东乙均得到胡给的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委状。他们虽各有很多的弟兄伙和徒弟，但这些人散在各个阶层，并不能集合成军，为了拼凑实力，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拉地方武装。我先后接到陈九魁、任克强的请示报告，问他们是否接受反共救国军的编制，我立即回信制止。说明我们是地方武装，责任是保卫乡里，不能接受其他任何编制名义，也不能离开地方，他们是想利用你们摆场面，并不能为你们解决粮响和武器问题。并即通令各乡，不要受任何迷惑。又集合常备中队和汉寿镇各自卫组织宣布上述命令。并说：我任付总队长是受黄爵高以志同事关系强拉的，现在他走了，我要为城乡治安负责，并保证不学杨挺生、赵常五将地方武装拖出去当团长、营长。

县警察局有个警察中队，中队长历来是本县人担任，但今年初却由省局委派了一个叫王用梁的当中队长。警察中队驻在县政府礼堂以北的院子里，我一天夜晚从县府秘书罗永翔处出来，听到王正向警丁讲话，我注意听，王用梁说：现在我接受了反共救国军委官加一级，上山打游击等，原来受了苏文华的勾引。这时警察局张若愚躲在宝轮院，赵朗如兼任督察长，我立即找他们商议，一致决定不能让王拖走警察中队。我要赵准备人选，次日，我借分子弹为由，用电话将王引诱到总队部扣押，派张云林接管了警察中队，队中大多数是忠义社的人，服从赵的命令，粉碎了苏、王的阴谋。

八、设政治部以后

十月底，三青团书记长姚中志由蓉返广向我说：照法令规定他应兼任自卫总队政治部主任，过去未管，现在决定来就职。我表示欢迎，我问李子元，他答：确有此规定，并查出原档案送我看后，我令腾出大殿靠南的屋作办公室，挂上政治部的牌子。姚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成立政工队，他说：县里很多青年要求为地方出力，应该利用起来。他很快集合了四、五十人，并集合请我讲了话。我讲的还是自卫总队的责任是保卫地方，不接受其他名义，也不离开地方，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共度时艰；第二，我提出建议以自卫队自用的名义，买一批盐库的盐以市价卖出，大部转卖赚些钱。我们买了四十包，卖出了三十包，赚了约二百银元。那时法币等于废纸，买卖讲银元，人们到手的法币不敢过夜。

我们对门张某（名字记不清）开的小书店中，有时可买到《新华日报》、《新观察》，我从上面看到国民党对几个大战役都是惨败，有垮台之势，已不能挽留。罗永翔神秘的借给我一本小说，并很快看完即还。书的内容是：写的东欧一个小国保加利亚共产党统治，搞阶级斗争，残酷镇压，杀人如麻，生产受到破坏，人们饥寒交迫，惨不忍睹，看后使人不寒而栗。罗还向我要过机枪子弹，因我是钱买的，为数不多，当然谢绝。

进入十一月，胡军过县西撤日多，在嘉陵江渡口架起了舟桥，市面秩序渐坏。过境胡军向县府要粮草、拉兵、乱放枪，卖军用物资，甚至枪弹。为了维持纪律，在下河街设了警察处，驻了宪军，王宇君兼任督察长。隔日召集军、警、宪的首脑开会，我也躬身其间，汇报讨论如何维持军风纪？姚中志指挥政工队向商家献捐，买烟酒之类，对暂住胡军进行慰问，期以此换取对地方不骚扰。

北路自卫队缺军服，我垫款买了二百套，结果未能收回垫款就解放了。机枪弹五十元一

箱，因缺款只买了几箱（每箱五百发）。杨宇逵有，他买的各种枪均有，给我运来轻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各一支。我将轻机枪、冲锋枪配给一、三中队，卡宾枪自用。我用十个银元买到一架德国望远镜，实际价值百元以上。

我知道姚中志是军统的。有一天我到他家见桌上玻璃板下压了一张文件，我细看是他的上级申斥他工作不力，没有完成任务，我注意他为何将这种秘密公开？他说：出了力还挨骂，现在只有另谋出路。原来他是使人相信，他对军统没有卖力，准备摆脱，下另一步棋。我和姚过去从未谈过这类事，且不测他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好默然。我一九四六在蓉被禁百日，很可能是他搞的鬼。

九、复杂混乱的时期

进入十一月下旬，胡军过境的秩序更乱，我二弟陶德昌所带的1008团从阆中开来，他是奉令开往陕西安康镇关布防的，我密告他：万一情况变化，可将队伍向广元移，共同保卫家乡。他团里运力不足，有一百多箱82迫击炮弹带不走，只好寄存自卫总队部。不久他的军长（番号记不清）陈长捷过广时，我送帖请他和参谋长及各处长到家宴会，他们到时都来了，但陈却手握一支卡宾枪未落坐即先进厕所去，出来时东叮西瞧，入席也把枪夹在腿间，好象不放心，使我心中很不快。

过境胡军的一些官兵丧失了信心，有的在找退路加入青红帮，杨宇逵有一夜在北街新磨摆香堂，他临时拉我参加，收了十几个兄弟，都是胡军官佐。老百姓更恐慌。大难临头，一贯道等迷信活动，乘机猖獗，连权老先生也拉我和杨宇逵穿上长衫去龙兴寺（现食品公司后面）以同善社仪式敬神，说求消灾免厄，不忍拂老人善意，只好跟到跪拜。

胡军的后卫指挥集团军司令裴昌会，城防司令是税警总队长朱兴汶。胡军连连败退，军心动摇，逃亡日多，因此拉兵更凶，青年人多惶恐不安。有一天，自卫总队卫兵也被拉去一人，迫使我筹计对策，见胡军的臂章一律是兰底白字，但不相同，税警队是个“汶”字，人称汶字部队。可以推之，臂章上的字是部队长的名字，我决定仿照改自卫总队的臂章。广元古称利州，我决定“利”字。石印太慢，为了快，请工匠到队部刻木模，立即用兰水印出一批，首先发给总队部人员、常备中队、救工队员等人佩带，接着汉寿县、河西、东坝、南河都先后买布来印，平日编入自卫队各勤务青年都首先买。胡军偷卖的军衣裤带上佩章，其他青年也要求收编领取符号，仅三、五日内，城、乡带“利”字臂章的军人满目皆是，人称“利字

部队”。胡军对此难辩，城郊拉兵的事也没有了，但这突然的现象，却引起朱兴汶的怀疑，他亲到西城楼观察三中队后，又到自卫总队部借拜访，查虚实，后来全部出城之危机已伏于此。

我与张隆德是亲戚，他去过陕北，住过抗大，他曾多次探我对时局的想法，决心！我警惕不敢露。进入十二月，风声更紧，他又来密问，我说：现在可苦你了，八[年]抗战，国家民族创痛剧深，日寇投降，毛主席就赴重庆谈判，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建家园。但蒋介石坚持一党统治，掀起全面内战，但又打不赢，而今大势已去，他们有的是黄金美钞，外国早有安乐窝，我们这种人，没有当白华的条件，只有等命运安排，自卫总队，我早本无意，是黄爵高苦苦拉之，现在他又走了，我更难卸肩，但我决不向国民党效忠，只对地方尽自卫责任，张隆德表示非常赞成，并约定随时通气。

赵明如这时已搬入大华纱厂为他准备的房子在华南，我们商定借他的住处宴请裴昌会探听虚实，裴和张参谋长到时都来了，裴态度平易，没架子。席间有参谋人员来报军情，他与张离席会商后指着地图说：从这里打转去。尔后他转面对我们说：较场坝不能再让了。他这时在席间安排这一幕，可能是有意安我们心的。裴对我们说：黄县长久不回来，县事不可无主，我意你们地方可推举出一人来当县长，我作决定。我们说：我们开会商议一下再回报。我们旋即请来权先生、杨宇连等人开会商议，开始大家推我；我说要管自卫总队，若再当县长，必致顾此失彼。侯宇初正无职务，他任县党部书记长多年，各方都均熟，最好找他功名心热，也使他过过官瘾。大家又议论了一番才同意。并推我去向裴复命，他即写了手令交我，侯元坤即接了县长的印，并贴出公告。这时谣言很多，如谣传要炸兵工厂、炸大华放火、抢劫……。我们秘商应付之策，并决定万一不能控制，即上东山据守，再不能立足，即向东退，千万不能让裹走。汉中一个保安团，前一时随胡军退广，驻下西坝，粮响无人管，吃饭都成问题。

大华纱厂派人来交涉，要求调派一个中队进厂保护，并送来四百元补助费。我说：情况多变，派部队进厂，下步不好走，我们已决定必要时上东山、守住东山就能保厂，请他们放心。

姚中志提议设各路指挥。我们商定：东路耿思九为分指挥，张必忠付之；南路姚兼分指挥，石平川付之；西路杨群生为分指挥，孙自强付之；北路兰竹山为分指挥，陈九魁付之。名单先不发表，由姚征求意见，并准备预刻印章。

赵朗如建议，把他浴室的工人编为运输队，把陶团所寄迫击炮弹运上山。我说：我们无炮运上山也无用，未采纳。

广元师范校停课，北路学生不敢回家，要求收编，我们商定编为青年队，由欧文凤负责编训。

十二月三日下午，朱兴汶请我去开会，我到总部，见无他人，朱二话没说，交给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是一纸命令，限自卫总队立即出城，到城西南沿南河警戒。我说：留一个班守自卫总队部。他说：全部出城，留人，到时不方便。我见他态度严峻，无商酌余地，知其怀疑已深，立即回部令总干事给两队发钱。（中队长15元，分队长10元，班队7元，队员5元）和食盐，总队部官兵一样，准备出发，一面请权、赵、侯、姚开紧急会议，告以局势严重，若不出城，将立被解决，我要亲自带队出城，相机行事，必要时往东开，随即集合队伍，宣布去向，并指定王尚武代理大队长，必要时好统一指挥。令李子元等留守。随即出发，时已近暮，权先生以独生子权百诚相托。张隆德赶来告诉说有部队找我，我无遐接待。我们到土城子驻寿家院，向南河沿派出警戒，并对附近胡军暗作戒备。

入夜，我几次出外查看，见到处是兵，一批人忙着往返向船上搬弹药箱，大多东一堆，西一堆。烤火烧的有些是门板。自卫队也照烤起来，烧了主人的柴，我临行赔了钱，我怀疑朱的动机，因此一夜未睡。

次日黎明，我进城看动静，在南门遇李子元说：北路已有枪声。我即返回集合队伍，乘胡军混乱向东开，途中朱兴汶派来付官请我，我立即混入行列，要人说付总队长前面去了。队伍进至东南拐角处，突闻东坝飞机场方向有秘密的机枪声，情况不明，不敢再去。前一天老鹰嘴驻的有胡军，也不能去，只有向南，乘渡船过南河，两个中队往返几次才渡完。这时解放军的炮弹已落到南河坝，我是跑步通过的，爬上南山回望，只见城内几处冒烟，解放军正从城中用大炮向乌龙堡轰击，嘉陵江上军用舟桥仍然存在，胡军已逃尽了，我旅馆的茶房姚家怀、姚家州背了我的被盖，跟来当了我的临时卫士。同时上南山的有警察中队的人，更多的是老百姓。我们继续南行，过龙潭场后，见一农民在叫喊说：前去的人抓了他的鸡，但分不清是什么人，可能是自卫队或警察中队，为了维坚声明，我赔给他一个银元。当夜，我们宿营三元场，半夜见有零星胡军过三元场南去，行动机警，作准备射击式，我们未敢过问。次日，我们东移卫子寺就寝，并派人去王家仓库领粮，我们是无力买粮的，（三元场吃的粮是买的。）

出于意外，姚、侯都未跟来，龙潭乡长石平川也未报城内情况，张隆德所说，也无部队派人来联系。日子在焦疑中过去，德昌带的那个团，听说经过旺苍退到阆中去了，下一步该怎么走？

十、起义回城经过

第三天下午，我三弟德厚和遂生字号的学徒何长林来找我了，他们带来马凤岐、张隆德的信，家里宋惠真另写了一封信说：解放军入城后纪律很好，公平买物，社会秩序也已恢复安静，新任县长李林枝要我带队伍带回，并已决定我为治安委员会委员。我即召集干部到场上一个庙里开会，宣布来信。我说：现在胡军全逃，局势已定，我们是自卫队，三日前被逼上山，现在应该遵令回城，将地方武装还给地方听候安排。我话刚完，第三中队长吴兴隆抢先发言说：共产党是先松后紧，我是亲自尝过的，不能回城。我接着说：国民党军队几百万打不赢，胡宗南几十万军队挡不住，我们这点力量更算什么？若说打游击，共产党是老内行，我们何能相比，即使不派人来打我们，时间一长王家坝存粮吃完了，总队部已无经费来源，又怎么办？如向地方筹，百姓能给吗？强迫征就要扰民，能持久吗？历史没有一千年不变，改朝换代次数很多，现大局已定，我们还是回去好，大家该想一想，不回去，如何结局？还要不要家？我说完后，大家议论了一阵，都想不出长期坚持的良策，表示愿意回城，我说：回去给班长、队员好好解释，明日黎明早饭后集合回城。

散会后，吴兴隆经过我住的房前，突然用所背冲锋枪向空发射一槽子弹，引起其他队长也放起枪，一时山鸣谷应，我下了几次命令才停止下来。吴的放枪是有意向我示威！（好久以后有人反映吴那时是想把队伍拖往苍溪九龙山。）入夜，我同李子元到各队巡视，尚属安静，但后来据报，一中队一个家住王家坝的队员（名字记不清）带枪一支逃走。

次日早饭后集合，一中队按时到齐，三中队住在半山却迟不下来，并零星放枪，我对一中队作了简短讲谈后，下令出发，司务吴襄突然大哭说：回去要遭清算！斗争！不要上当？我说：我是付总队长，清算、斗争，我一个人承担，决不连累大家，不回去在外，不能持久，总队部已无钱，王家坝的米不多，还有你们的家还要不要，大家无言。我再下令出发，这时警察局（队）的人早走了。

我带一中队走了十余里暂停休息，又有人放机枪，这次主要是想过瘾，（因为队长、队员都是用机枪鸣的）我到梅树铺后，久等队伍不来，我疑生变，正给李子元、王尚武写信，

要他们权衡利害，仍然回城，不要骚扰百姓，自取灭亡。信还未送走，两个中队也都来了，李、王向我说：他们又开了会，虽然有人想打游击，但你不在，估计前途不会好，所以仍然回城了。当夜即宿梅树铺场上，家在南路的队员续有离队，但无人带枪走。

十二月十八日早饭后，两个中队集合，我又讲了一次话，说明只有回城才有前途，在外面必无出路，随即出发，行至距龙潭不远处，一个解放军拿着（记不清号数）部队的字条来找我们。我答复他说：我们就是回城。他即折回复命。队伍到龙潭后，清查队员已走近三十人（未带枪）。自卫队把枪打成两捆，我向石平川说明回城的理由，并要他雇人把两捆枪背运进城，约定队伍明天到南山下等候。我乘滑竿先进城接洽，当夜宿杏树垭，随行的薛联升和姚家怀兄弟，为避免误会未带枪。次日在接官厅换了军服，着便衣进城，由马凤岐领着去见李林枝县长报告经过，李县长说：你们的行动我完全了解，现在没时间谈，快回去把队伍交了，有工作等你去做。

我赶到接官厅，见解放军已指挥先到的一中队将武器弹药集中摆好，解放军一个官长对合集的队员讲了话，我也讲了话。解放军把接管的队伍开往下西坝。三中队因在杏树垭吃饭迟到，走到县政府门前带交的枪，后来两个中队编成了县大队。叫石平川找人运的两捆枪因人们害怕找不到人运，打好捆的枪，只好派薛联升再设法搬运回城向解放军作了交待。计共交步枪一百五十支、轻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各一支，子弹万余发交清。存总队部的82迫击炮弹一百二十余箱和几十支废步枪，是解放军自己接收的。

我的一支手枪被石平川留下，也是解放军去取的。还到我家去取左轮、勃朗林和子弹百发，还有一支三号勃朗林是我在前方缴的，在枪柄上有烙印，原拟留下作纪念，但怕犯嫌疑，后来交给了李林枝书记兼县长。

姚中文编组的第二中队未及点名即解放了。他们是走在南山下折回向驻天主堂的解放军交枪的。我又写信照李林枝县长指示召回了河西权玉如；大滩李开太带出去的自卫队，将地方武装还给了人民，工作至此完成。此后，我对自卫总队人员，尽量免接触，免犯嫌疑。连卢百臻管的帐目也未清问，以至在后来三反运动中说不清楚，非常被动。

李林兼县长到任不久，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将自卫队带上南山？我说：上南山不是预定计划。当反共救国军头头阴谋挖自卫队墙脚时，我曾明白宣布，自卫总队的职责是保卫地方，决不能接受其他任何名义，也决不离开县境。在解放前有一天下午，国民党城防司令强令自卫总队立即完全出城时，我对权先生等人说过，我将相机摆脱控制，开向大石、张